

●语言哲学  
○专题研究

**编者按:** 哲学中语言转向的发生和语言观由交际工具变为人的存在方式,语言哲学成为当今的热点学科。然而,大多数学者却一味地盯住同语言对应的世界尤其是外在物理世界不放,希望通过语言分析去揭示客观世界。其实,语言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语言同人的世界在外延上相同,因此语言哲学的学科目的是人及人的世界。本期刊发的两篇文章都从不同维度出发,聚焦于人及人的世界。此处,人的世界包括客观世界、内在世界和主观创造世界,三者缺一不可。

# 语言与存在的信仰维度: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sup>\*</sup>

白臻贤

(湖南商学院,长沙 410205)

**摘要:** 主体性遮蔽了本真的存在关系。人活在语言中,人对语言须臾不离的依赖状态是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之一,然而在已有的存在叙事中,语言成为缺席的他者。语言不是客体而是主体,语言使存在的意义显现,语言是存在之本。消解存在焦虑的根源,追寻人生的意义,主体性应走向主体间性。

**关键词:** 语言;存在;主体性;主体间性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0)05-0001-6

## Dimensions of Language and Being From Subjectivity to Intersubjectivity

Bai Zhen-xian

(Huna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Changsha 410205, China)

Men live within language, their dependence upon language is one of the basic survival ways of themselves. Yet in the narrations of being, language becomes the absentee. The authentic relations of being is obscured by subjectivity. Language, the subject, is the homestead of human beings. To overcome the anxiety and to reach the fully significant ends of life, intersubjectivity should replace subjectivity.

**Key words** language; being; subjectivity; intersubjectivity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是本真的存在关系,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是人的生存方式的根本变革。“人的主体性在语言作用下走向主体间性是一种哲学必然。”(成晓光 2009: 9)当主体间性超越置换主体性成为必然时,我国外语教学却仍然是主体性的天下,普遍存在以教育对象的可塑性为基础,把教育的对象当做物,把语言当做工具,把教育看成主体对客体的认识甚至对客体的

改造,教育活动成为实现主体力量对象化的过程。在此背景下探讨语言和存在的信仰维度有助于还原教育的意义,达到对生存意义的领悟,实现人本真的生存。

### 1 存在的焦虑

存在是生命的延续,是自由和创造。焦虑是对存在的思索,对本体生命的追问。当思想家言

\* 本文系湖南省教学改革立项课题“基于主体间性视域的大学外语课堂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湘教通[2009]321号)的阶段性成果。

说,“人活在语言中,人不得不活在语言中,人活在程式性的语言中”(钱冠连 2005:35),“语言是人类最后的家园”(钱冠连 2005:104)的时候,是对当下已失去家园的忧思,是对生命价值的探寻和对生存意义的叩问。人对语言须臾不离的依赖状态是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之一,然而语言与存在断裂,在已有的存在叙事中,语言成为缺席的他者,成为历史永远的客体。

“中国人的问题比哈姆雷特的问题严重。哈姆雷特的问题是:‘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但对中国人来说,活着不是问题,怎么活着才是问题;怎么活着也不是问题,怎么活得像个人才是问题;怎么活得像个人也不是问题,怎么活得像自己才是个问题。”作家刘震云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说过的一段话坦露了他对人对存在的无比关切。“活着还是死,怎么活,活得像个人,活得像自己”,这是东方中国人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什么东西存在着?”(What is there?)是哲学家追问千年的命题。虽然社会进步了,时代变了,但存在问题仍在。人们说焦虑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确,有存在的地方就有焦虑。当存在遭遇战争屠戮、生命和思想毁灭、价值缺失、信仰崩溃的时候,人们感到焦虑、恐惧、愤怒,感到痛苦、绝望、迷惘……他们会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荒原的过客,一个现实世界的寄居者和证人,一个失落了精神家园的漂泊者。

吉登斯说,焦虑的种子植根于与原初的看护者(常常是母亲)分离的恐惧之中。母亲的子宫是世界上最温暖和舒适的家,当我们意欲切断时间,同过去的一切,诸如童年、情人、故交、故乡、故国、自然、文明告别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正经历着与“原初的家”分离的恐惧。我们离开母亲的子宫,从此失却了母亲安定宁谧的怀抱,茫然漂泊于不确定的世界。(马大康 2009:1)漂泊者并不只是站错了位,从绝对意义上说,是离开了母亲安定宁谧的家,无家可归。家园失落者的焦虑是“一种悬在空中的感觉,心灵无处着落”。在临床心理学界和精神病学界,焦虑的定义有三个因子:(1)焦虑是一种烦躁、急切、提心吊胆、紧张不安的心境;(2)焦虑者往往伴有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症状;(3)焦虑往往是没有相对固定的对象和明确的内容。日常生活中,有很多词都可以来表述焦虑:着急、紧张、害怕、心烦意乱、心神不宁、坐立不安、七上八下、热锅上的蚂蚁等等。焦虑(anxiety)这个词来自于拉丁语中的 *angh* 是狭小或收缩的意思。齐克果在《恐惧的概念》中指出,

焦虑乃是人面临自由选择时所必然存在的心理体验(Kierkegaard 1944)。人在生命的旅途中处处面临选择。正如定一条新路一样,我们无法预见路的彼端究竟隐藏着何种危险,因而必然产生焦虑的体验。焦虑是面对虚无和自由时产生的一种眩晕。存在-人本主义者对焦虑的观点是:焦虑的产生来自根本的存在焦虑,存在焦虑是对个体存在的责任和限制的恐惧。和其他心理疾病一样,焦虑是因为人们不能真实地对待自己、接受自己,否认自己真实的想法、情感、行为。罗洛·梅认为,焦虑乃是“人对威胁他的存在、他的价值的基本反应”(May 1967),是一种不确定性和无依无靠的感觉。焦虑的产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现代社会引起价值观的丧失和分裂。罗洛·梅认为,“时代变换时,当旧的价值观是空洞的,传统习俗再也行不通时,个体就会感到特别难以在世界上发现自己”。现代社会的竞争激烈和理性至上造成人的情感和理智的分裂、爱情和性欲的分裂、价值和目标的分裂,从而破坏了人格的统一性。第二,焦虑产生于空虚和孤独。空虚并不是源自内心一无所有,而是由于人对自己的渺小和无力感到的失望。空虚的结果是,如果人们发觉自己无从影响社会和别人,就会情感退缩,变得越来越冷漠无情;或者向专制和权力投降,彻底丧失自我存在的意义。

我们不知道神的焦虑,但是人总是让存在的焦虑以各种方式呈现出来。亚伯拉罕也有焦虑,“亚伯拉罕的焦虑”是来源于信仰和伦常的冲突。上帝为测试亚伯拉罕对自己的忠诚程度,命亚伯拉罕献出自己的爱子以撒来做祭祀。亚伯拉罕遵守上帝的指示,将儿子带到摩利亚山,正要举刀时,上帝派来的天使阻止了他。不知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考验还是不信任,亚伯拉罕对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发生了动摇,他变得很焦虑。欧洲启蒙时代思想家在批判神学对人性的摧残的同时,渴望有一种神圣的人性,以代替神的缺失。在宗教问题上,他们内心充满着焦虑。少年维持以虚无、吟叹、自杀来取代宗教或社会教条,从广义上说,象征着青年人当社会价值由“集体规范”向“个体创意”快速翻转时的自我怀疑与何去何从之焦虑。《狗日的足球》中的主人公柳莺为了进入主流的语言体系,努力将自己培养成一个足球迷。在此,足球是作为男性语言体系的象征而存在的。当柳莺进入足球比赛现场,进入男性语言的真实语境中后,严酷的现实立刻击倒了她。“当她鼓起勇气,想表示自己的愤怒,想对他们的侮辱进行

回击时,却发现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供她使用的语言!没有。没有供她捍卫女性自己、发泄自己愤怒的语言。所有的语言都是由他们发明来攻击和侮辱第二性的。所有的语言都被他们垄断了。”这一“发现”标示了女性生存的终极处境,这种“绝境体验”充满了深具本体意味的焦虑和深刻的愤怒(王侃 2008 4)。这是女性群体面对语言时所表现出来的焦虑,是她们对自身根本处境所表现出来的本体焦虑。

哈贝马斯于《后民族结构》中转引霍布斯鲍姆“用晚期浪漫派的笔调”所写下的一段话表述了他对冷战结束以后的当代世界的看法:“短暂的20世纪结束了,却留下了一堆问题,没有人能解决这些问题,也没有人声称能解决这些问题。世纪末的人们在全球性迷雾中为自己开拓出了一条通往第三个千年的道路,他们知道的仅仅是,一个历史已经结束了。其余的,他们一无所知。”(Habermas 2002)他指出,最晚从1989年开始,人们意识到一个时代的终结,但与此同时,人们并没有感受到世界已经太平,前途无比光明,人们还是感觉到自己生活在惊恐与不安之中,还是被一种失望和受挫的情感所笼罩。在现代社会,如果没有永远的真福在上提携我们,那一定有尘世的肉体享受在下控引我们。当人只剩有肉体的时候,麻木的生活让人焦虑,或者焦虑使人麻木。“我”既不多于肉体,也不少于肉体,因为“我”就是肉体。麻木让人感到他对世界的感知和反应能力在逐渐退化和失去,他对自己存在的感知也开始模糊和不真实。物质财富被不断地创造的同时,现代文明将人与自然割裂,人与他人割裂,也将人自身割裂。现代社会科技飞速进步,日新月异,在高速地创造和改变世界的同时,却并没有同比例地提供关于世界的“意义”。反之,这个使人目眩神迷的物质世界,加上各种各样的欲望叙事,使得与人类精神生存相关的“意义”成为迫切需要拯救的全球化焦虑,意义的空无化危机因之突出地成为整个时代不祥的征候。

对于焦虑,古希腊时期人们认为,应采取接受命运的斯多葛主义的态度。到了中世纪,出于天主教的背景,焦虑被看成不适当的情感。而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认为应该使用理性来控制焦虑。但丁在《神曲》里表达了这样的信念:理性和哲学可以帮助人们辨认出邪恶的道路,但是要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则必须依靠信仰和神学。在信仰时代,有神或上帝的眷顾,人们可以将包括焦虑在内的一切,交付神或上帝。上帝的介入能平息意

志的骚动和焦虑不安,灵魂在上帝永恒的喜乐中享受平静。宗教的价值能承载现世的伤痕,可是上帝死后,谁成为人们短暂生命的慰藉和患难时的避难所?什么能撑起因为上帝消失而坍塌的世界?答案是理性。人们把一切赌注都押在一个理念上:用理性代替神学。有了理性发展科学就有财富,有了财富就有幸福;有了理性就有真知,有了真知人就有了自由。

对焦虑的消解,人们找不到万良之策。焦虑与存在如影相随,或者说,焦虑就是存在的一种负值的表征。但是,当焦虑转化为一种诉求,去探究造成痛苦的根源,争取本真的存在,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自身的和谐共处时,焦虑对存在的思索、对本体生命的追问就成为一种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在对焦虑和存在的介入中,无论古代本体论哲学、近代认识论哲学,还是现代主体性哲学,语言都没有登场露面,它成为缺席的他者和叙事的客体。语言应该走上前台,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因为它是存在的家园。

## 2 主体的遮蔽

就人的存在而言,严格来说,欧洲在19世纪之前并没有关于“人”,以人为对象、客体和内容的科学。康德开创的以“人是什么”为基本问题的新人类学将“人”变成了认识主体和理解主体,人既是知识的主体,又是知识的对象。通过19世纪无数思想家的努力,“人”被建构起来。但是,作为人主体内容的“人性”、“人道”思想把对人的有限性的分析当做人的无限本质(董学文 2005 455)。作为生活着、劳动着和说话的存在,人是有限的,因为人毕竟是从从事着生产和交换并进行话语说的自然的存在,受制于劳动、生命和语言。存在不是僵硬的形而上的抽象同一,而是生命在劳动和语言中的延续,是灵魂在劳动和语言中的再创造。如果把无限性、创造性和绝对性交给有限的人,结果将是“人”的膨胀和破裂。人的概念建构起来,牺牲的是人的事实存在。也就是说,人已经消失,“人”已经死了。其实,无论是对“人之死”抑或对“上帝之死”的隐喻性言说,都是对其本真存在被遮蔽的申说。本真存在的遮蔽是当下社会的焦虑之源,本真存在的遮蔽源于主体性。

主体性是近代理性启蒙的产物,是欧洲近代哲学的中心。它以理性反对神性,进而以理性征服人类,征服自然。所谓主体性,是指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主体对客体的优越性,客体被主体构造和征服,主体成为存在的根据。近代哲学认为

存在不是独立自在的客体,它归根结蒂是理性的产物,具有主体性。主体性从本质上是活动主体在同客体的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自觉性、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目的性等主体的属性,是活动主体区别于活动客体的特殊性。弗莱德·R·多尔迈曾对现代主体性的特征进行过概括:

(1)以统治自然为目标的人类中心主义;(2)以自我为中心的占有性个人主义;(3)不包含类主体性的单独主体性。(Domay 1992)主体性肇始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笛卡尔把主体作为人的专门范畴从一般实体范畴中独立出来,探究主体如何超出自身去认识客体的问题。笛卡尔认为,所谓主体就是指自我意识或心灵自我意识或心灵,虽然与物体同为实体,但与后者却有本质的区别:物体的本质是广延,而自我意识或心灵的本质则是思想。文艺复兴运动把人从神权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还原人的自然本性。理性成为反对愚昧无知和盲目信仰,引导人们探索自然和社会奥秘进而主宰一切的力量。理性是人类摆脱愚昧,走向自由解放最重要的工具和成果。人类通过理性精神,恢复自我意识,将自己的目光从上帝转向人、从天国转向尘世、从宗教神学转向哲学,人性得到高扬。作为主体的人挣脱了人对神、人对人、人对自然的绝对依赖关系,成为世界的主宰者。主体性意味着个体性和理性,它是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所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人的主体性在摆脱封建的黑暗统治,确立资本主义自由、平等的法权观念中得到充分的张扬,它也为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和工业文明的繁荣扫清了道路。近代西方的个人主体教育培育了西方社会的理性主体,带来了西方工业的文明和进步。理性主义成了西方传统文明的最大特征。

“主体性”本来是讲自由和独立自主性,然而“主体—客体”关系的发展使“主体性”走向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征服自然、使自然为人所用的“主体性”反而被抹杀,为自然所奴役。理性至上主义抹杀了人的情感、意欲、本能等等人性的重要方面,从而限制了人的批判活动和自由创造活动的范围。这种无所不在的理性的过度发展成了统治人们的一种新的枷锁,理性的僵化和绝对化使人们重新不自由了。对于理性扼杀人的情感和想象,荣格认为,当代社会中的理性统治的思想是我们最大的也是最悲剧性的幻想(Jung 1988 75),因为理性象征的原始力量和丰富意义消隐了:打雷不再是神的愤怒,闪电不再是神的报复,河流不再有精灵,山川草木不再与我们跳舞和对话。

“我们已使所有事物的神秘和超自然面暴露无遗,再没有任何神圣的事了。”一切不再有象征意义,情感枯竭在理性的专制中。“主体性哲学”的“主体性”概念和“主体—客体”关系的思维模式其实在尼采那里就遭到了“摒弃”,他认为建立在“主体性哲学”基础上的人本主义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疏离、对立,抹杀了人的情感、意欲等人生的重要方面,使人变成了知识、科学的附属品,生活变得毫无审美意义。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提出此在的共在问题,认为“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这是对“主体—客体”模式的直接冲击。福柯提出“人之死”,认为作为只具有理性的、独立于客体之外而宰制客体的人是不存在的,人主要是非理性的。

由于主体性是建立在“主体—客体”认识关系基础上的,主体将自身之外的一切都视为客体,对它们进行支配、占有和改造,为自己所用。主体和客体被分离,客体自然成为被征服、改造的对象,他人是被利用、支配的对象。在我国教育领域依然普遍存在以教育对象的可塑性为基础,把教育的对象当做物,把教育看成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对客体的占有和掠取,把教学过程视为特殊的认识过程,教学的目的就是占有以教材为载体的知识;或者以现代实践观为指导,把教育看成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实现主体力量的对象化。其结果是把教育变成一种心灵隔离的训练。现代社会中,随着个人主体性的张狂和泛滥,主体性本身所潜藏的危机和缺陷已暴露无遗。(陈海平 2006 4)首先,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人类本来想通过自己的行动来主宰自然,自然却越来越脱离人类的控制,威胁人类的生存,人类与自然同一的关系发生了裂变,由与自然的同一走向与自然的对抗。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把自己变成了中心。其次,人与社会关系的扭曲。个人与社会之间由最初的依附,发展到近代以来的对立和冲突。对自我而言,他人与社会关系都是异己,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所有关系都可归结于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私欲的膨胀带来了人性的扭曲和人与人关系的恶化,造成人与社会的不协调。个人的自私自利、社会的两极分化、贪污腐化、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核威胁、民族国家间的冲突等社会问题的出现,反映的则是人与他人、与社会关系的扭曲。再者,人自身的异化。上述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人与他人、与社会关系的扭曲等所有问题的深层根源就在于个体人格的分裂。当对理性的倡导走向极端而变成对理性的迷信,进而走向

理性的专断和霸权时,人的意义世界也在这种理性的张扬中被埋葬了,理性也从人类肯定、发展自身的一种手段变成目的本身,人失去了价值主体的目的性意义而成为技术操作的对象。人的身心发生分裂,人成为只具有理性而无“人性”、缺少信仰和价值关怀的“单向度”的人。人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人不仅要满足衣食住行的需求,更欲追寻人生的价值、意义,找寻人生栖居与生存的家园。世界的意义并不是自在,也不是他在,而是自在和他在的共在,自在和他在不可分隔地融合在一起。存在的意义不是此在的存在,不是彼在的存在,而是此在和彼在的共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提出了此在的共在问题,认为“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此在自己本来就是共同存在。此在本质上是共在。”“此在”不可能单独、孤立地存在,此在之独在也是在世界中共在。“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他人的在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神学只关注上帝的在是与是,在上帝眩目的光环下找不到此在。主体性只凸显自在而无视他在,自在挥舞理性的利剑刺得他在遍体鳞伤,就如神学一样,主体性消解了共在的世界。主体性凸显自我这一主体而将他者遮蔽,也将自我摧毁,由此埋葬了本真的存在和关系。

### 3 家园的向度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是人的生存方式的根本变革。主体间性意指存在的人与世界的同一性,主体间性的依据在于人的生存本身。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建立了本体论的主体间性(Heidegger 1987)。本体论意义上的主体间性是主体间的共在,它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理解关系。马丁·布伯认为,作为存在的关系,主体间性本质上是一种“我一你”关系,而不是“我一他”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神的关系;“我一他”关系是主客关系,是非本真的关系;而“我一你”关系是本源性的关系,是超越因果必然性的自由领域(Martin Buber 1986: 140)。主体与主体之间通过对话、交流而达到充分沟通,彼此理解,最终把对象认识变成自我认识、自我认识变成对象认识,从而把握世界的意义。可以说,主体间性强调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它是对主体性合理发挥的规约。主体间性是本真的存在的关系。

西方哲学由主体性研究到主体间性研究的转向过程中,以内在性为指向的意识哲学和主体形

而上学渐次瓦解,语言显现并介入存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个传统都以某种方式关注语言问题,在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中,语言上升为中心论题。哲学解释学认为,人创造了语言,但人却从属于语言;人所创造的语言不是人的一种工具,而是人的存在方式。从这个角度看,不是人在使用语言,而是语言构成人的“存在”。我们只有通过语言来理解世界,语言表达人与世界的一切关系。一方面,世界虽是独立存在的,但它必须进入语言之中,通过语言向我们呈现出来,才能表现为我们的世界。表面上是人发明了语言,实际上是人通过语言并在语言中发现自己。世界与人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语言性关系,因为对人来说,世界就是语言的世界。一个人永远是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的。语言并不是观念的表象,不是实在的反映,相反,它与人的生存可能性联系在一起,它就是人的某种生存方式。我们通过语言而在世,就如同我们通过身体在世。因为人有语言,所以人能够建立起一个使用符号的天地,人与自己的过去、物和他者建立了关系。世界用语言呈现自己,而人则用语言去感知世界。

语言就其本质而言是主体间性的。在海德格尔看来,对世界存在的认识只有由一种特殊存在——人的存在才能完成,世界只有在人的认识与牵挂中才有意义;而人对世界的认识与牵挂是与他的生存处境密切相关的,因此对世界存在的认识必须首先变为对人的存在的认识。而人的存在是由对人生的理解决定的,在对人生的理解中语言起着关键的作用。语言似乎与其他活动一样,无需解释,为我们直接经验。但是,语言是交谈的产物,交谈是主体间性的活动。语言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产物,即不是人给世界命名。如果没有另一个主体,是不需要语言的。正是由于人类在社会生活的交往中,主体与主体之间有了交谈的需要,才产生了语言,而言谈是主体间性的行为。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言谈,而言谈是“共在”的所在。(海德格尔 1987: 197)在语言的运用中,并不是人在使用语言,而是语言自己在运动,人被语言所支配。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这就是说,语言即谈话本身成为主体。语言本身是使存在物和存在得以现身的存在。

语言是生命存在的表现形式,是人们认识和体验世界的方式,是存在的家园。人的外在是一存在物,人的内在要对存在进行思考,思考离不开语言。如是,存在问题就把人从外到内地牵引到语言中去了。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同时

也强调,人栖居在语言所筑之居所中。这就形成了存在—语言—人的重叠关系。在人的本质、在场与在场者、语言这三者的关系中,语言是支撑物。语言伴随着人的一切活动,它是人类社会的最根本、最深刻的基础,所谓词语不出场时无物存在,只有词语才使那物存在。当代社会理论认为语言有如下社会意义:语言是社会和人的基本沟通手段和体系;语言是人的生活的基本模式和基本形式;语言是权力运作的脉络;语言是行为和思想产生互动的象征性中介体系;语言是生活世界的经验的总结。(高宣扬 2005 138)语言不仅是人类的交际和认知工具,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在者。海德格尔认为,语言一旦说出或被写出,也就是说,语言一旦变为“论述”,它就是一种存在,一种同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存在具有同样性质的存在。作为一种存在,变成为“论述”的语言就具有生存的力量,具有自身运作的逻辑,具有某种规律。李洪儒认为,“作为在者,其特殊性至少体现在:拥有自己的构成单位及其相互关系联结起来的系统,拥有自己的运作机制”(李洪儒 2006 2)。原初,语言由人创造;一旦作为在者存在,就会对人行使决定或制约功能;既内在于人,又是人及其世界的存在家园。人为了生存与发展,必须做事,开展各种活动,以言行事。人的言说就是人以语言使自己出场或现身,没有语言人不能出场或现身。本质和存在都在语言中说话。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语言伸展多远,现实就伸展多远。(陈嘉映 2003)语言不仅表达思想,它就是思想本身。语言构成我们的生存方式,语言就是我们存在的最后家园。语言不仅仅是解决交流或思维中具体问题的一种手段,人在很大程度上听凭语言的摆布,人不可能不经由语言来适应现实。人活在语言中,人不得不活在语言中,人活在程式性的语言中。此三种人类基本生存状态充分表明存在问题是如何把人类从外到内地牵引到语言之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语言被视为人类最后的家园。(钱冠连 2005 66)事实上,存在或世界都是建立在语言之上的,语言是存在之本,它规定了我们的想象与思考方式。没有语言我们不能回顾和联系过去,没有语言我们不能规划和展望未来,没有语言

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

语言指向可能的存在、应然的存在、自由的存在和本真的存在。语言学习的过程是我们长大成人的过程,是确立自己真实存在的过程。语言不是客体而是主体,语言使人与世界充分交谈,使存在的意义显现。人在语言中生活,语言不仅为人们遮风挡雨,它还使人们看清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语言拥有人”(叶起昌 2008 27),语言是存在之本,是人类永远的精神家园。

#### 参考文献

- 陈海平. 从主体性的内在困境到交往实践观的历史超越 [J]. 云南社会科学, 2006(4).
- 陈嘉映. 语言哲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成晓光. 语言哲学视域中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建构 [J]. 外语学刊, 2009(1).
- 董学文. 西方文学理论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弗莱德·R·多尔迈. 主体性黄昏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 高宣扬. 当代社会理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哈贝马斯. 交往与社会进化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 哈贝马斯. 后民族结构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7.
- 李洪儒. 系词——人在语句中的存在家园 [J]. 外语学刊, 2006(2).
- 马丁·布伯. 我与你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6
- 钱冠连. 语言: 人类最后的家园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荣格. 人类及其象征 [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8
- 叶起昌. “人拥有语言”与“语词拥有人” [J]. 外语学刊, 2008(2).
- Kierkegaard, S. *The Concept of Dread* [M].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
- May, R. *Psychology and the Human Dilemma* [M]. New York: Norton, 1967